

◆序与跋

《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序

萧致治



近年来,湖南邵阳的文化学者们组建魏源文化艺术研究院,专门从事魏源文化研究,编辑《魏源文化》杂志,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将魏源研究置于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追本溯源,找到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起点,提出了“魏源不仅是我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而且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大师”的观点,这是魏源思想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他们认为,近现代化,从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二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三是思想上的理性化、科学化。中国近现代化,起始于1860年之后的洋务运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三个阶段:政治上终止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经济上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思想上趋向于理性与科学,打破了传统的闭关锁国与等级森严的制度,正朝着民富国强之路迈进。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魏源的思想闪烁着无比灿

烂的光芒,成为引导中国走向近现代化的理论宝库。

这种引导,首先是学风引导与建设。在中国近代那样一种禁锢的历史氛围之中,开启新的学风难于上青天。恰恰在那样的环境中,魏源成为经世致用思想的集大成者,开启了道光以后中国学术研究、学校教育的新风气,使读书的人群摆脱“锢天下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的乾嘉学风,而转向将读书、研究与治理国家、政治建设等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国家前途。这种转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魏源思想影响、造就了中国近现代大批人才。本书的作者们认为,魏源不是在课堂上直接讲课培养人才,而是通过他的思想,及其务实的理论、治理的方法、教育的理念,来影响为政者的学风和执政理念与人才培养。道光以后,清朝各书院的讲学,转向经世致用。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本来就讲究经世致用教育,此后,更加以开放的态度来培养实用人才。曾国藩、胡林翼等大批湘军干将,都深受这种学风的影响。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该校的前身即是具有浓厚经世氛围的城南书院。他们都不是读死书的人,因此,拿起笔杆子可以治国,拿起枪杆子可以安邦。

对于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一书,本文集的作者们超越了地理的概念,站在纵览世界全局的高度来阐述其历史意义和价值,认为该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巨著。自此,国人开始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对世界不再是闭目塞听和两眼黑。具体表现在:一是改变了国人盲目自大的思想。古代国人均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就好像北斗星一样,被众星拱卫,加上地大物博,这种思想就更是根深柢固了。二是认可西方文化。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异是一个讲道,一个讲艺。在中国古代的词汇中,有道、艺、术、技、巧等概念,唯独没有“科学”一词。在魏源《海国图志》一书问世之后,人们对西方以艺事为主的文化,逐渐接受,并找到结合点。左宗棠曾指出,不能用中国的道来否定西方的艺,也不能用西方的艺来否定中国的道,而是要两者结合,各取其长。这种思想后来被张之洞演变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大力宣传“德先

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得西方文化在中国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以迅猛之势影响中国近现代化进程。

魏源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一是改革弊政。魏源主张新疆设省,“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保京城”;改革兵制,主张招募土著、以免调兵,淘汰劣兵、增强战斗力,推荐西洋国家的练兵法,发展海军、使用枪炮,他的这些军事改革思想,后来基本上被湘军将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采纳。二是推进国家制度改革。他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考》等书中的材料,介绍了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戊戌变法,其思想根源在于魏源。三是促进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的主要代表有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地方总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采纳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富国强兵,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开办了一批军事学校,培养了大批近现代化人才;开办翻译局,大量翻译外国资料;创办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军事改革。四是推动教育改革。中国教育从传统的科举制向近现代教育制度的转变,就是由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发展而来的。因为要学习外国人的先进技术,就必须学习外国的语言,学习外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再到发展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等领域,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

为了展示魏源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作用,邵阳市魏源文化艺术研究院从《魏源文化》杂志及《邵阳学院学报》等有关期刊中选录了论文20余篇,汇成《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一书,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本人受托为该书作序,作为魏源故乡人,盛情难却。故略纪梗概,以志盛举。

是为序。

(萧致治,武冈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性,一经友人的点拨,识者的扶植,自然就破土而出,在他那身处的特定时空中,迅速获得了社会的回响、受众的接纳,成为夫夷江畔、崀山脚下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了。

在这个借文学的“亮眼”重获光明,凭改革开放的新时势而走向成功的坎坷曲折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两点是特别应该注意的。一是曾令超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关中“友”这一伦的珍重和描写,另一点是曾令超在学习和尝试以笔墨问世的道路上那种超乎常人想象的锲而不舍的韧劲,愈挫愈奋的干劲,敢试敢为的闯劲,这也是我们从他的坎坷跋涉的人生记录中所应珍摄的宝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曾令超平凡而轶群,踏实而雄迈的人生,不正好可成为我们每一个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奋进的读者的借镜吗?

(曾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



灯谜属民间文艺范畴,是汉字派生出来的文艺形式。它的制作,主要依托于汉字一字多音多义、一词多解,以及汉字义、形、音诸要素的复杂变化。其史迹源远流长,内容包罗万象,作品雅俗共赏,意趣健康高尚,受众遍及城乡。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今天,邵阳市政府认定邵阳灯谜是文化瑰宝,不仅批准将其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保护,以利传承;还在主持编纂《邵阳文库》这项文化大工程时,将其列入编书目,促其成稿,助其出版。这一系列举措,实在值得点赞。

或许有人不解:谜乃小道,历来难登大雅之堂,只在假日节庆期间供平民百姓猜一猜乐一乐就行了,如此厚待它,到底它有何价值呢?

灯谜肇始于《弹歌》,发端于隐语。远古聚居于雪峰山麓的先民,已借助隐语传递渔猎信息和表达宜忌。隐语孕育并演变成谜语。谜语通过民众口耳相授,以及歌谣俚谚、地方曲艺、杂书逸闻而广泛流传,产生并发展成为文义灯谜。灯谜这种独到的艺术形式,渗透进了国人血脉,融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朝野的交替变迁,人间的悲欢离合,都能在灯谜中找到踪迹。因而,系统发掘和研究历代谜艺中蕴含的人文掌故、野史资料,有助于鉴古观今,资治教化,具有相应的历史价值。

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始将谜语纳入文学范畴。故民间谜语素称口头文学,文义灯谜被褒称为微型文学。灯谜的遣词拟句,谋面立意,都颇费匠心。“谜圣”张起南称其有三品:传神阿堵,余味盎然,是为神品;文章天成,妙手偶得,是为能品;别开生面,妙造自然,是为逸品。明清以来的历史演义、志怪小说、戏曲传奇、风情趣话等诸多作品中,借用灯谜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寄寓自身情感,揭示作品主题,已蔚成风气。尤其是清代,谜艺成熟,谜风鼎盛,后人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灯谜之说。灯谜被归结到一代文学之林,恰恰见证着它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灯谜的谜面精练短小,内涵却无所不包。举凡古史今事、天文地理、宇宙万物、百科知识,皆可囊括入谜。此所谓语小天下莫能破,语大天下莫能载。然灯谜作为中国特有的益智性、趣味性、知识性的异化思维文化现象,有它自身的艺术和美学品赏规律。制谜要求文通字顺,意贯气联,扣合熨帖,剪裁得体。猜谜要求掌握谜理,知识面广,善于动脑,巧运神思。无论制谜或猜谜者,都应去驰骋联想、探索谜底;谜中的词性转换和概念推理,都应合乎逻辑,不悖常情。

当代邵阳灯谜,有其艺术魅力和恒久价值。犹如一面镜子,它反映了邵阳人民的新生活新思想,折射出城乡建设的新成就新面貌。尤其是1982年以来,谜艺文化活动由“自娱自乐型”的消闲嗜好,逐渐打造成讴歌改革开放、助推经济发展、愉悦市民身心、开展海内外交流的广阔平台。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对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更是关系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关系到国家文化凝聚力,关系到文化生产力的形成和延续。具体到对待灯谜这类古老而独特的民间文化,则应与时俱进,适应新常态,寻求新机遇,力求在精心保护中开发创新,在开发创新中深化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具体到谜人队伍,都应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当务之急要在年轻一代中,发现新谜手,搞好传帮带,培养接班人,迅速改变创作队伍萎缩乃至后继乏人的现状。具体到谜艺活动,要始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寓教于娱,以优秀作品鼓舞人,激发正能量。

让我们齐心协力,将邵阳灯谜这朵文艺奇葩,打造成团结市民共圆中国梦的得力助手,打造成邵阳本土联络外部世界的文化名片,为构筑和谐安定的美丽家园增光添彩。

(曾令禄,邵东人)

◆读者感悟

《人生跋涉》读后

曾镇南

曾令超是我国当代著名盲人作家。《人生跋涉》是他的一部自传。我曾研究并评论过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长篇小说,也曾隐约猜测到他的文学创作带有某些自叙性的色彩;但是,直到我认真地读完这部长篇自传后,才更深地了解了因仗义勇为而负伤失明的法官为什么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能取得如许的创作成绩。曾令超以他朴素而生动、切实而具象的描叙,在自传中,写出了一个个倔强勇毅的革命者在坎坷曲折的人生长途中永不止息的奋斗精神;而他在几乎陷入人生的黑暗绝境时找到的文学之路,正是他不忘走进革命队伍时的初心,一仍其贯地在一个新的生活领域里继续践行其奋发自强的人生追求而已。《人生跋涉》提供了一个革命者艰难跋涉,向着崇高的生活目标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不断纯洁自己的心灵的人生典型。

若要具体地概述一下《人生跋涉》的价值,我以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曾令超在因公负伤失明之前,从少年到中年生活历程的叙写,简洁而真挚地写出了一个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少年,在新社会的阳光雨露化育中,在党的教育浸润下,怎样成长为一个有觉悟、有文化、能思考、富情义的与时俱进的时代新人。这个成长的过程是平常的,也是奇崛的。因为这个农家少年酷爱读书,也酷爱自由,对不平等有异常的敏感,对正义也就有执着的追求。他既尝过生活苦涩的滋味,也不时放飞自己对真、善、美的遐想。他像一只倔强而踏实的“水牯”,上

学就天天向上,刻苦钻研,努力做品学兼优的学生,储学以待时代转机。回乡务农则学瓦匠、学犁田等劳动本领,当保管员的短暂经历,也成了初任公职、严格律己的一番历练。回到母校当民办教师,上完师专当中学教员,他就勤学苦练,恪尽教师的天职,知难而进,硬是把一个差班带成了向优选班看齐的好班,自己也成了深受学生爱戴、家长称许、领导表彰的先进。当然,这一切看起来是那样平常,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普遍经历过的。难得的是曾令超结合自己的家庭状况、身处的“小社会”状态、亲历的时代进步与转机,在一件件生活细节的描写上,打上了自己倔强而敏感的个性烙印,写出了人生曲折中个人内心的起伏,这就使读者看了,常常有感触相通、同声相应、有会于心之慨。

这本自传的价值另一方面,或更为世人看重的一面,就是曾令超见义勇为负伤失明后,一度陷入茫然困厄之中奋而学习文学创作,几经坎坷,终渐有成的不平凡的历程。这是大多数富有同情心、能够设身处地体味视障人士处境的读者所不能不叹服的。曾令超为什么能?是他有过人的文学异秉吗?还是他得到了贵人的点拨、识拔?粗看起来都有一点,但都不是根本。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在此前所接受的教育和历练中,已经成长为一个有朴素的党性的共产党员了,同时也成长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坚毅的品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与人交流、互润感情的能力了。总之,他具备了丰厚的生活积累的潜能,又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